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G. JOHN IKENBERRY

自由主义利维坦

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美] 约翰·伊肯伯里 著

赵明昊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013070600

D5
172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G. JOHN IKENBERRY

自由主义利维坦

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美] 约翰·伊肯伯里 著
赵明昊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D5
1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
转型/(美)伊肯伯里(Ikenberry, G. J.)著;赵明昊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ISBN 978-7-208-11544-6

I. ①自… II. ①伊… ②赵… III. ①国际政治-研
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3209 号

责任编辑 龚 权

封面装帧 王小阳

自由主义利维坦

——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

[美]约翰·伊肯伯里 著

赵明昊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25 插页 4 字数 289,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544-6/D·2308

定价 48.00 元

献给我的妻子恭香玲子
和儿子杰克逊

丛书总序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敢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

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降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国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本丛书将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寻觅国际战略领域的精品。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巨制。

王缉思

2008年新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译者序

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未来命运向来是学界争论的重大议题之一，从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到查尔斯·克劳萨默的《单极时刻》，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到约瑟夫·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从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到尼尔·弗格森的《巨人》，这一争论一直未曾停息。¹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似乎变得更加激烈，及至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时代已然终结”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²还有人超越了对美国首要地位(primacy)的关注并提出，世界政治的转型不仅仅是权力分配的变化，有关全球秩序的思想、原则和规范也在发生改变，而中国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最大挑战。³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讲席教授约翰·伊肯伯里也加入了这场争论，并在2011年5月出版专著《自由主义利维坦》，深入阐述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看法。他认为，虽然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发生了改变，美国与外部世界订立的“霸权契约”(hegemonic bargains)也面临再谈判，但其所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特性、基本规则和原则安然无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未遇到竞争对手，恰恰相反，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以及经济和安全相互依赖度的增强为这一秩序造就了新的拥护者。

《自由主义利维坦》实际上是美国国内大战略论争的产物，伊肯伯里是这场论争中“新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

“新自由国际主义”对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的调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书不仅可以使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如何构建和维护国际秩序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而且有助于认知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美国领导层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思想底色”。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应对和融入既有的国际秩序,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权力与规则的关系,《自由主义利维坦》对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战略选择、战略规划和对外政策行为具有宝贵的启发意义。“权力与规则并非敌人”,这不仅是美国也是中国须铭记在心的箴言。

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特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领导构建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liberal hegemonic order)的内在逻辑、变化特征和未来命运。按照伊肯伯里相对简约的定义,国际秩序是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相对稳定的和程式化的安排,而世界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得以确立,即制衡(balance,如18世纪的欧洲)、统制(command,如19世纪的大英帝国)以及赢得同意(consent,如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和欧盟)。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民主国家一直在努力构建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的国际秩序。而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以其无可匹敌的实力地位,围绕着多边机制、同盟、特殊关系等,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规范为基石,推动建立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种特殊形态——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这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秩序,体现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规则和权力的融合。

全书共有八章,除引言和结论外,第二章至第四章为理论探讨部分,第五章到第七章为实证阐释部分。为理解战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的逻辑和特性,作者首先梳理了历史上不同类型的世界政治秩序,

并着重对不同的等级性秩序,即帝国主义等级性秩序和自由主义等级性秩序作出区分,提出后者需要主导国按照协商而得的(agreed-upon)、制度化的克制与承诺来运用权力。第三章和第四章探讨了主导国在全球体系中如何进行支配(rule)的问题,作者阐述了主导国的两大支配模式,即“以规则支配”(rule through rules,如美欧关系)和“以关系支配”(rule through relationship,如美国在东亚建立的毂辐体系),⁴前者强调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的多边承诺,后者则是指按照主—从关系来构建秩序。作者认为,单极条件往往会诱使主导国选择以关系支配的模式,但随着单极权力的衰落,主导国将更多地依赖多边规则和制度。

第五章以清晰的历史脉络和理论逻辑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如何推动建立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作者指出,美国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希望通过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一种更具普世性的全球秩序,但由于冷战的出现,这种秩序构建只能在西方民主国家(包括日本)内部展开并以美国为中心,而且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苏联威胁,美国最终在东亚建立了一种具有附庸关系性质的同盟体系。某种程度上,美国将联合国所体现的自由主义精神和北约以及东亚同盟关系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很好地结合了起来,美国成为了“自由主义利维坦”,“受他国邀请而进行领导”,并且反过来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为他国提供了“服务”。作者提出,从提供安全、创造财富和促进社会进步而言,这一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是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秩序,在冷战终结之后,这一秩序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内部秩序”成功扩展为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外部秩序”。

但在冷战结束后的近20年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and 危机。作者所关注的是全球体系的长期性变化,一方面,美国虽以单极力量出现,但其霸权权力的正当性因苏联威胁的消失而逐渐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基石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主权规范受到侵蚀,对别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和“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美国小布什政府曾试

图在单极条件下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新秩序,其对外战略被视为以改造世界为目标、以单边黩武为特征的“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⁵作者着重分析了“布什主义”缘何最终失败,指出美国企图以单边主义挣脱其自己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徒劳无益。当然,其他非西方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是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另一重要因素。但是作者认为,这一秩序遭遇的危机实际上是“权威危机”(crisis of authority),是秩序内的权利和权威重新分配和秩序治理方式需要重新调整的危机,是该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成功建立并得到巩固和拓展所带来的结果,虽然美国作为该秩序中的霸权力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深层逻辑(开放性和以规则为基础)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接受,这一秩序实际上“易于加入、难以推翻”。

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发展,作者提出三种可能性:一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被重新协商并得以存续;二是出现一种后霸权自由主义秩序,美国扮演起普通角色;三是自由主义秩序全面衰败,世界政治陷入非开放的和不以规则为基础的状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命运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一是美国让渡自身权威并接受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意愿;二是美国利用安全和军事实力与其他国家达成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契约的能力;三是中国和印度这类非西方崛起国家是否会继续接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本书的最后,伊肯伯里就美国如何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引领该秩序的转型给出了建议:美国需要让渡一些在霸权时代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需要继续倡导那些能发挥实际作用且深具共识基础的规则和制度,要选择“以规则支配”的方式,并在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之中,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和衰落国家、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分享权威。伊肯伯里相信,如果美国足够聪明并正确地打出“外交政策牌”,未来几十年中,美国仍将是一个由开放市场、民主社群、合作安全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所构成的世界的中心。

二

伊肯伯里关于国际秩序问题的另一本著作是2001年出版的《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的重建》,⁶通过对1815年、1919年和1945年三次国际秩序重大变迁的深入探析,回答了赢得大战胜利的国家如何运用新近获得的权力这一问题。他的核心看法是,这些国家倾向于采取制度化举措约束自身权力的施展,以赢得较弱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默许,从而“锁定”其在大战中获得的有利地位。伊肯伯里的分析路径和观点体现了其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传统的折衷态度,他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针对的是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者的困惑,即为何强国会同意将自己纳入国际制度之中或接受其约束。但同时,他又突出强调了国内民主制度和国际秩序的宪政性之间的深刻关联,体现出其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仍是自由主义的,他是威尔逊主义的忠实信徒。这种理论选择上的折衷态度和开放性也自然延续到《自由主义利维坦》一书之中,作者在前言中称此书可被视为《大战胜利之后》的姊妹篇,其意在强调他对国际秩序问题一以贯之的学术兴趣和理论取向。

可以说,《自由主义利维坦》一书所要申明的核心思想是:权力和规则并不是敌人,它们可以成为朋友,两者在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过程中缺一不可;只有在一个由规则构成的体系中运用,权力才是最持久和最具正当性的;而规则也只有建立在共识基础上并受到相应的权力结构的支撑时,才是最持久和最具正当性的。这本著作带给我们的启发还在于,它强调“当前的国际秩序并不是美国,也不是西方的”,这一秩序继承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诸多原则,解决了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建立稳定的国家间关系的“霍布斯难题”,同时又通过维护开放性和坚持以规则为基础促使国家能够利用“洛克的机会”进行合作。既然这一秩序并不完全属于美国和西方,那么,未来世界政治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必然局限于西方/非西方这种二元结构之间,会比西方与非西方的刻

板分野更加复杂。

伊肯伯里关于崛起大国并不会必然推翻这一秩序的观点也大致符合经验性认识,一是因为这些国家从加入这一秩序中得到了切实的收益;二是没有可以完全替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能得到各国普遍接受的备选方案;三是崛起国家需要通过对自己进行某种程度的制度性约束以阻止或缓和外部施加的各种制衡。这本书将使我们对外崛起国家和既有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但是,伊肯伯里在这本书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及论证过程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首先,他对帝国主义等级性秩序和自由主义等级性秩序(即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或者说帝国和霸权的区分依然不尽明确。早在1953年,英国学者加拉格和罗宾逊就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指出英国通过一种“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的方式进行着统治,它在英帝国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并培植和利用当地精英作为代理人管理殖民地,尽可能少地使用武力解决问题。⁷那么,美国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为这种“非正式帝国”?如果说帝国要依靠武力的话,那霸权也是如此,“自由主义”和“利维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紧张关系,霸权从其本质上而言并非民主的和自由的。⁸此外,伊肯伯里总是从威尔逊那里为自由国际主义溯源,但应当承认,威尔逊时期的自由国际主义和现如今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者所抱有的思想还是具有显著差异的——前者强调的是以真正的法治为基础,通过大国平等合作共同保障和平,而后者支持的则是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中心且更具等级性的国际体系。⁹

其次,伊肯伯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过分美化之嫌。自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创设之初,权力而不是规则就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联合国体现的是“大国共管”,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安理会显然不能说完全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过程则鲜明地体现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从布雷顿森林协议得到全面执行的1958年,到1965年戴高乐政府推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1971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一体系始终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之中。此外，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单极的迷恋使欧洲感到担忧，欧盟决定在美国和北约之外建立独立的军事力量以在自己的领地内维持秩序。欧洲国家还对美国的贸易、财政和金融状况的消极发展趋势做出了回应，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好和支持美元。此外，伊肯伯里认为冷战后西方的“内部秩序”拓展为世界的“外部秩序”，这充其量也只是在经济领域，但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则无论如何也不能称其为自由主义的。

第三，伊肯伯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回避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以规则支配”到底是形式和手段，还是实质和目的？他在书中提出，“秩序内部的政治权威来自于法律—宪政基础而非权势”。他还称，秩序内的合作并不会使华盛顿放弃政策自主性，因为合作意味着所有人根据我们的方式来行事，美国的“国内规则 and 规定会成为世界的规则和规定”。这不禁让人想到，即便美国遵守国际规则，也不过是走个形式，难道小布什政府当初不绕开联合国而掀起伊拉克战争就是值得赞许的吗？而事实是，小布什政府的确曾努力寻求获得联合国的授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看，美国历任总统在安全事务上几乎从不根据什么自由主义原则或国际规则来进行处理，他们坚持美国例外主义，从不认为在维护美国安全方面应受到国际机制或协定的限制，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科索沃战争，抑或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更不消说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开展至今的“隐蔽性行动”(covert actions)。¹⁰

第四，伊肯伯里虽然提出了权威重新分配的问题，但并没有触及如何分配或者怎样分配才能既满足崛起大国的需要又能维护美国的首要地位。他一方面承认美国将在未来的自由主义秩序中扮演一个较前不那么具有中心性的角色，一方面又呼吁美国推动重建全球体系，重新确立自己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权威。客观而言，既有国际秩序的危机不仅是“权威危机”，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功能危机”和“正当性危机”。¹¹显然，多极化发展并不会自然使世界进入一个多边主义的时代，新兴国家

对美国 and 西方的全球统治地位的不满在日益上升,在贸易、金融、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它们希望修改规则。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全球制度中的特权。比如,国际能源机构的投票权是根据 1974 年各国在全球石油消耗总量中的比例而确定的,这一机构至今仍排除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能源消耗大国和俄罗斯这类重要的能源供应国。虽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但这顶多算是“修法”,而非重新“制宪”。¹²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治理项目主任帕特里克所言,“我们无法保证新兴国家会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新兴国家之间也不可能存在相同的世界观”,“在 21 世纪,多边合作的规范基础将变得更加薄弱,与 19 世纪早期欧洲的‘大国协调’有几分类似”。¹³最终影响新兴国家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障碍可能来自美国内部,为新兴国家创造一定空间需要美国政府在心理上作出调整,在这一问题上美国面对的真正挑战或如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英国的批评,“英国已经失去了帝国地位,但却没有找到一个新的角色”。

三

可以说,《自由主义利维坦》是 2001 年“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国内大战略论争的产物,它非常全面而鲜明地体现了以伊肯伯里为代表性倡导者的“新自由国际主义”思想。“9·11”事件以来,在美国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和国家实力陷入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国国内战略界人士就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大战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他们深入检讨了“布什主义”的“战略短视”和“战略虚耗”弊端,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性质、范围和特征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设定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目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大战略主张。

“布什主义”大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美国需要增强和巩固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对恐怖主义组织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

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宣扬“主权有限”,推动“民主输出”,弱化和摆脱国际制度的约束,运用各种必要手段确保美国全球霸权地位,使“单极时刻”固化为“单极时代”,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布什主义”的直接后果是让美国陷入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并因美国的黠武单边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激起“反美主义”情绪,给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布什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新帝国大战略”或“改造(世界)的大战略”。¹⁴

但是,这一“新帝国大战略”很快就遭到美国国内重量级战略界人士的反对,他们或是通过个人著书立说,或是通过“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Princeton National Security Project)、“凤凰倡议”(Phoenix Initiative)等集体研究,¹⁵在“战略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¹⁶这一总体观念下提出了几种替代“布什主义”的大战略选择:一是以罗伯特·阿特等人为主要倡导者的“选择性介入”(selective engagement)大战略。“选择性介入”旨在追求霸权与孤立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路线,它仍坚持美国应捍卫全球领导地位,认为“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能拥有实施国际领导的综合国力”,但主张将美国的主要政治军事资源集中投入到对美国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地区,即其所处的西半球、欧洲、东亚和波斯湾地区,通过“介入”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势力均衡”。¹⁷二是以克里斯托弗·莱恩等人为主要倡导者的“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大战略。这一大战略认为,美国的最大战略目标是保持西半球霸主地位,防止欧亚大陆出现霸权国家,维持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美国不应寻求支配欧亚大陆和海湾地区,在这些地区,势力均衡可以“在没有美国军事存在的情况下形成”,“作为一个离岸制衡者,最大的成功在于让别人去处理麻烦的问题,而不是急于把负担揽到自己身上”。¹⁸三是以伊肯伯里等人为主要倡导者的“新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强调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应着眼于重建自由国际主义的世界秩序,通过与其他重要国家达成“新的契约”,通过维护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延续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¹⁹

这些大战略主张基本上都承认或暗示美国实力的有限性以及美国单极地位的不可持续性,强调美国应采取“战略克制”的总体政策路线,重新平衡国内发展和国际负担,不应继续奉行好斗的全球战略,不应继续耗费有限的国家实力,不应继续过于依赖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不应仅仅注重近期威胁而忽略长远挑战。在这一大战略论争中,具有跨党派共识基础的“新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对奥巴马政府产生了最为显著的影响。

新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主要倡导者除了伊肯伯里,还包括安-玛丽·斯劳特以及“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迈克尔·弗卢努瓦等人。²⁰

在“新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主张的倡导者看来,“世界上并不是充满了仅仅专注于安全并处于战争边缘的国家”,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深化决定了大国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出现。因此,美国面对的真正威胁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些国家所带来的单纯的地缘政治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是复合的跨国性威胁,而这些威胁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其负面效应不断积聚和显现。²¹但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推动建立并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基础正受到侵蚀,以至于无法有效应对上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大战略显然是行不通的,而过于克制的大战略则会使美国无法针对“真正的”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在一个充满多种跨国性威胁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美国需要一种“以环境为导向”的大战略,而不是“以地位为导向”的大战略,要努力设计一种即便美国变弱时仍然有利于美国的制度安排,并从现在起就对这种制度安排进行“投资”。美国的大战略目标应是“建立一个法治的自由世界”,并“通过自我约束而非不受任何约束发挥领导作用”。

在重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过程中,美国需要让渡部分特权,以换取其他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持续支持,还应大力倡导和巩固那些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且深具共识基础的国际制度,“以规则行规制”。第一,建立“民主协同体”,与“志同道合的”(like-minded)国家共同推动跨国性

问题的解决。之所以要建立“民主协同体”，一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更有基础和更有效率，“集体行动”的困难较易克服。二是利用这种“民主协同体”对美国的权力做出自我限制，美国应在“民主协同体”中保持低调，始终注重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能力和意愿相协调，以合作性、集体性的行动来解决问题，增强集体行动的合法性。²²第二，美国需更多融入集体安全机制，并促进“安全共同体”的建设。²³重建安全联盟，给盟友更多的发言权。第三，重建全球机制中的“保护性基础设施”(protective infrastructure)，以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如可成立“穆斯林发展互助团”(Muslim Development Corps)。²⁴第四，借助体系性力量应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也就是说，要努力使更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全球体系变得更强以吸纳这些新兴力量，特别是“扩展西方”，以形成中国等新兴力量与更广大的西方或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群体打交道的局面。第五，要在美国国内倡导自由国际主义的“公共哲学”，对冲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情绪和“杰克逊主义”倾向。²⁵

值得指出的是，“新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倡导者在“民主推广”问题上提出了与“布什主义”大战略明显不同的观念和构想。一方面，他们认为美国必须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并要充分意识到“美国和世界的接触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一信念的基础上”；²⁶另一方面，他们对民主的看法做出了调整，“受民众拥护、负责任和尊重民众权利”而非“一人一票的选举”才是界定民主的标准，美国“民主推广”战略不应依赖“政权更迭”，而是要为其他国家实现民主自由尽可能地创造有利条件，以使民主从内部生发。²⁷

四

从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所发布的各种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决策高层人士在多个公开场合的讲话及其相应的外交实践来看，奥巴马政府总体上倾向于“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大战略思想，并表现出鲜明